



历史人物

张氏兄弟与二甲镇丁家

□王十朋

张瓚武先生在《张謇最早的卫士和亲随》一文中提到“先祖初为布贩,后在二甲丁裕大司帐,收账夜行,常喜趁吴同行为卫。”“先祖”即张謇,“吴”即张謇的卫士和亲随吴体臣。“二甲丁裕大”即“丁裕大”花布行,由二甲镇丁家开设。丁氏祖籍镇江,清代道光年间迁来通州二甲镇。清光绪年间经营过油坊,这个油坊名“裕隆”,开办于二甲镇南边的定兴桥一带,是二甲油坊业中开办较早的一个油坊,但开办时间不长,就转让给了安徽歙县人程泽夫。后程泽夫在原址开设了“鼎隆油坊”,为“南通东四坊”之一。此前,丁家在二甲开设了“丁裕大”花布行,张謇即在此行做账房先生,由此开始了张氏兄弟与张家的交往。该花布行是二甲镇上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商号,其址在今二甲镇通海街南(当时称为“南安镇”),房屋较多,前通街,后通河(陈家河),朝东门面,门前有虎头牌高悬。丁家之盛,始于丁松斋、丁润斋这一代。由于清光绪年间丁润斋曾任过通州盐运分公司运判(驻石港、管辖10个盐场)。丁松斋的儿子丁子贞(名志清,子贞是他的号)则担任过阜宁县知县,回乡后担任余西市第二初等小学校长、余西市学董、余西市自治会董事、议事会议员等。故丁家在二甲声名显赫。“丁裕大”花布行门前的虎头牌系御赐之物,亦称“部贴”,牌上方是虎头,虎头下直书四个大字:“闲人莫入”。有了此牌,除本身免于纳税外,还有独家经营的特权。如果是同行的小商贩在二甲镇上开业,也得经该行批准,还得向其交费。故该行生意十分兴隆,收花时节,南安镇上(今通海街)人来人往,摩肩接踵,十分拥挤,行人走路也感困难。

“丁裕大”花布行内有一敞厅,厅内悬挂御赐竖牌,竖牌两边是盘龙,上面横书“奉旨”两字,下面竖写“旌表”两字。由此显示了主人的身份。该花布行一直开设到民国年间,曾代上海永安公司收购棉花。

清代光绪初年,二甲镇商业逐步兴盛,西坝一带更是繁忙。为使上下坝船只能够通行,由丁家出资,将坝头拓宽,安设绞关,以利船只往来,使这个土布、粮食集市更为兴旺。丁氏进而开办了“丁裕兴盛”过坝行,对来往船只收取过坝费。过坝费为每石粮食二分,当时坝上二百余名工人成天忙个不停,将粮食过斛装船。过坝的粮食最多时一天可达二三千石,全年过坝费收入达万余元。

经查阅《张謇日记》,自清同治十三年即1874年到光绪十年(1884)间,张謇几乎每年都要到二甲去,有时一年要去几次,除了到丁家外,还到束家、邵家、曹家去,这几户都是二甲镇上的商业大户。如:光绪九年(1883)十一月二十五日,因通海减捐事去二甲,寓丁氏。光绪十年(1884)十一月二十七日,与敬夫同之二甲,宿丁氏,闻松生讣。

清宣统二年(1910)十一月,丁润斋逝世。十一月十七日的张謇日记:“润斋今年卒,年七十二。”是日,张謇作挽联一副:“湖州载交亲,适馆设餐,曾共补经敦友好;愿诸郎继述,饯迓饮食,无忘箴有遗言。”这副挽联回忆了与丁润斋相交三十年的情形,是互相亲近的好友,食宿方便,并与束锦(张謇的好友)素所喜好。叮嘱润斋的年轻子弟继承丁氏的遗志,兄弟之间友好和睦,不要忘记丁氏临终之前的遗言。可见张謇与丁氏关系的密切。

在旧社会,商人如能与官府、官僚相结托,就能为自己经商带来极大的便利。因此,丁家不但在二甲镇的花布业、粮食业、油坊业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而且与官府声气相通,与张謇、张謇兄弟俩关系更是密切,丁子贞的姐姐是张謇的干女儿,在她生小孩时,张謇特意派人送了几斤西洋参,以示关怀。作为余西市学董的丁子贞还聘请张謇担任余西市第二初等小学的名誉校长。1916年4月,二甲镇在镇西南的关帝庙内创办余西市第十三国民学校,仍聘张謇为名誉校长。关帝庙内有张謇书赠“天汉声扬”、丁松斋书赠“德配天地”的两块大匾。张謇从1914年起至1917年间一直担任余西市二初小(后改称第二国民学校)、十三国民学校的名誉校长,这都是因了丁家的关系。

1920年4月,在修建老通吕公路时,原来规划不从二甲经过,因为张氏兄弟与丁家的关系,老通吕公路特地经二甲绕道而过(其中一段即为现通甲路),加之坝头的繁荣,二甲就成了远近闻名的“水陆码头”。

直到解放后,人们还在丁家老屋内看到过张謇题字的匾额,可惜在“文革”中付之一炬。

征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江海风物、老建筑、习俗杂谈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

沈寿:执掌南通女红传习所的仿真绣大师

□赵明远



图1:沈寿



图2:沈寿刺绣作品《意大利皇后像》



沈寿(1874—1921),初名云芝,号雪宦。江苏吴县人,客居南通。刺绣大师。其绣品作为慈禧七十大寿寿礼上贡,慈禧亲笔书赠“福”“寿”两字,从此更名“沈寿”。1914年,张謇在南通创办女红传习所,沈寿应聘担任所长兼教习。

沈寿七岁起从其姐沈立学绣,十四五岁时绣艺已名扬姑苏。其绣品作为慈禧七十大寿寿礼上贡名声远扬后,清廷于农商部下设绣工科,委沈寿任总教习。1904年11月,沈寿夫妻由清政府派往日本考察。沈寿从日本美术绣、欧洲素描、油画、摄影艺术中得到很大启发,从此决心对传统刺绣进行革新。

中国传统的陈设性刺绣,以摹写书画为主要内容,称为画绣。刺绣自身独特的表现力则因此受到制约。在西方艺术的写实主义精神启发、感染下,沈寿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刺绣艺术体系——仿真绣。在艺术思想上,仿真绣以写实为宗旨,追求物体自然形态、光影层次的立体效果。在技法上,除继承传统针法外,吸收日本刺绣中的虚针、肉入针技

术,并创造了旋针、散针两种新针法。仿真绣的创立,改变了延续千年的传统艺术表现手法,将中国刺绣艺术带向一个全新的领域。

这期间,沈寿成功绣制了第一幅仿真绣肖像作品《意大利皇后像》。这幅作品在1910年的全国第一次博览会上备受推崇。就是在南洋劝业会上,张謇对沈寿精湛的刺绣艺术造诣有了深入了解,不久即派南通女师学生追随沈寿学习刺绣。1911年,《意大利皇后像》在意大利都灵万国博览会上再获殊荣,夺得最高奖。会后,清政府将此绣品作为国礼赠送意大利皇室。意皇后致信盛赞中国艺术,并回赠沈寿钻石金表一块。

中国妇女普遍熟悉刺绣,如能教习她们提高技术,绣出精品,就能助其掌握谋生技能,实现女性的自立自强。因此张謇决定在南通建立一所刺绣学校——女红传习所,而所长人选首先想到了沈寿。1914年8月,沈寿正式就任南通女红传习所所长兼教习。在她亲自规划和传授下,女红传习所学制完善,渐具规模,成为我国近代刺绣教育的中心。1920年,张謇又创建南通绣织局,请沈寿兼任局长,并在上海九江路、纽约第五街开办分局,在瑞士、意大利等地建立销售部,使南通刺绣进入了国际市场。

沈寿在南通期间曾饱受病痛折磨,

但她“非病不能起立,无一日不为诸生勤勤指授”。张謇请名医为她治病,安排她休养,考虑到她职务繁重,屡欲给予加薪,沈寿均坚决辞谢。沈寿曾对姐姐沈立说:“瞿公知我,以绣托我,知己之感,吾心尽我力以为报。”而张謇对她人品、才能更加推崇,赞其是“实业界仅见之人才,教育界最近之模范”。

1915年,沈寿完成了旷世杰作《耶稣像》。作品运用各种针技、上百种色线,以写实手法将耶稣遇难时头戴荆冠、血迹满面、两目失神的痛苦表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幅作品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荣获一等奖。1919年,病中的沈寿历时三年完成了她最后的代表作《倍克像》。这幅作品以美国名伶倍克的照片为蓝本,凭借自己的刺绣光影实践经验,将倍克表现得惟妙惟肖、光彩照人。这两幅绣像均被张謇收藏于南通博物苑。后虽因战乱几经辗转,但张謇后人精心保护,并于1986年献归祖国,现存于南京博物院。

中国刺绣艺术绵延数千年,历代艺人口手相传,相关的著作和文字记录寥寥无几。清道光年间丁佩虽著《绣谱》,却对针法无专门叙述。刺绣著作的缺乏使得许多绝技失传,沈寿、张謇常为此深感痛惜。1918年前后,沈寿病痛渐重。张謇恐其技艺失传,嘱其总结一生经验,进而决心共同努力完成一部绣谱。

传统工艺历来难以笔录,艺人一般不善文字表述,而文人不谙其技,难书其妙。张謇不顾年事已高,事务繁重,担当了撰录绣谱的重任。病中的沈寿从一物、一事、一针、一法开始审慎思忆,详细讲解,张謇则分门别类,记录整理。许多难以表述的技法张謇均概括出来。就这样先后三易其稿,完成以沈寿晚年雪宦定名的《雪宦绣谱》。1920年,这部凝结着沈寿毕生心血的著作在翰墨林印书局出版。《雪宦绣谱》由张謇作序,分绣备、绣引、针法、绣要、绣品、绣德、绣节、绣通八节,系统总结了沈寿的艺术观,全面论述了刺绣过程中的要领方法,重点讲述了18种基本针法,及沈寿独创的“仿真绣”理论。全书内容完备,条理清晰,通俗易懂,是一部杰出的刺绣理论著作。近代著名收藏家朱启钤评论此书说:“其书集绣法之大成,持衷中外,确有心得,可俾后人奉为圭臬,且开中国工艺专书之先,断非丁佩之谱所可同日而语。”

1921年初夏,沈寿溘然长逝于南通织绣局寓所,年仅47岁。

在扬子江畔南通黄泥山(现称马鞍山)麓有一片幽静秀美的园地,近代刺绣艺术大师沈寿就长眠于苍松翠竹的荫蔽环抱中。墓室前的石牌坊上有张謇的题字“世界美术家吴县沈女士之墓阙”,后立汉白玉墓碑,前篆张謇手书灵表,后刻沈寿遗像。

再说陈才福的起义与投降

□李元冲



读了姜松延先生的《关于陈才福的若干史实补遗》(见7月27日《南通日报·城市记》)一文后,颇受启发,文中对本人在《海门抗日史上的两次“木马计”》(见6月2日《南通日报·城市记忆》)一文中研究的主要人物之一——陈才福补充了很多很好的材料,从而开宽了对陈才福研究的视野。但本人对于如何认定史实有些不同看法,特提出来与姜先生商榷。

从姜先生的《关于陈才福的若干史实补遗》(以下简称姜文)中看出,支撑姜文的主要“史实”是1939年4月15日上海《时报》的报道《陈才福部计取海门》。陈才福诈降后的“起义”事件,实际上是一件没有成功的“起义”事件。但姜文引用的上海《时报》却把它说成是成功的事件,并认为这就是“史实”。

姜文引用的上海《时报》是这样记载的:“本月(指4月)12日午刻,陈氏故意在海门日军特务机关宴请日方长官宾本三郎,苏北警备司令……下一百余人,席间突然由陈氏一声暗号,与乔装送礼夫役之陈氏宪兵队(即敢死队)互相呼应,内外夹击,于二小时中,即将百余名之日军官及大小汉奸扫数歼灭。”

其实上海《时报》报道的这件事,本来应是陈才福的计划,但由于情况突然,宴会没有如期举行,当然也就谈不上宴会上发生的“百余名之日军官及大小汉奸扫数歼灭”之事了。《中共海门地方史》(2015年版)第六章第三节是这样记载的:陈才福“策划以召开‘中日亲善大会’为名,在4月11、12两日,乘日伪双方长官莅会之机,突然下手,杀死日伪头目。时适逢日本侵略军宣抚班长平松、伪海门县知事施仁心赴省,会议未能如期举行。”由于宴会没有如期举行,当然也就不可能发生后面的事情了,至于后续的一些事更是子虚乌有。

由此可以断定上海《时报》的报道不过是一篇有人事先提供的计划,或者说如是如意算盘,根本不是史实。我们从报道的时间上也可以看出端倪。上海《时报》发表《陈才福部计取海门》是在1939年4月15日。而陈才福起义事件是发生在4月12—13日两天(实际上后续的“剿匪”事件延续至4月18日),但4月15日上海《时报》就报道了(据姜文透露,上海《时报》4月14日就有有关报道,并且还用了“血战两昼夜”之句),中间仅隔2天(如“血战两昼夜”中间就没有间隔了),因此这很像是一场战争直播。所以这篇报道应是事先定稿的报道,作为长长当时国人的志气是可以的,但作为“史实”恐怕不宜。由此笔者认为:由于提前透露了行动信息,或许是这次“起义”失败的原因之一。

那么对于陈才福的诈降事件事实是怎样的呢?对此党史早已有结论。我们

先来看看《中共海门地方史》第六章第三节对陈才福假投降是如何记载的:

“1939年3月25日,陈才福部率高文星中队官佐约1000人向南通日本侵略军及海门警备队‘投降’,被收编为通海启崇绥靖队,陈才福被委任司令。”

“1939年4月12日上午,高文星率领一部至体育场,佯称枪毙‘逃兵’准备起事。余部仍留守营地。陈才福带领部队在茅镇西接应。9时许,高文星为被捆的‘逃兵’松绑后,即令部队向体育场隔河相望的驻海日军警备队开火,遭日军猛力还击,相持十多分钟,未能得手。高文星唯恐日军从西边包抄过来,遂令部队边打边退,待与留守部队会合后,便撤离茅镇。当高部路经伪县公署时,向公署内射击了一阵,击毙传达员一名,旋即冲入伪县公署,俘虏伪警察所警察38人,缴步枪13支,在混乱中击毙伪警察长单德才,伪警察所书记周仲光,拘留所内人均被释放,随后高部迅速西撤,日本侵略军追击至茅镇西市梢。”

“4月13日陈才福部一个中队在通海公路的兴隆镇准备伏击从南通方向来的日本侵略军……由于情报不准确,突然从茅镇出发的日军卡车自大兴镇由南向北驶来,伏击队员措手不及……日军的掷弹筒、重机枪向陈部阵地疯狂射击,不少士兵和逃难的群众被击中,陈部士兵阻挡不住,迅速撤退,战斗进行了半个多小时。此战陈部20多名士兵阵亡。”

《中共海门地方史》对陈才福假投降的

事件用了1200多字进行记载,作为一部党史对“野鸡”部队有这么文字记载,实属罕见。由此可见在海门抗日史上,陈才福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对于陈才福的评价,《中共海门地方史》中说:“日本侵略军侵占海门之初,各种地方武装力量(包括陈才福的武装力量——笔者注)组织的战斗虽没有多大杀伤力,但打响了海门抗日的‘第一枪’。”(当时是抗日初期,海门共产党的抗日武装尚未建立——笔者注),这就在党史中肯定了陈才福及各种抗日的武装的抗日举动。

《中共海门地方史》对陈才福假投降及起义的记载,我们还可以从日伪档案中找到佐证:1939年5月,日伪为庆祝“海门县公署”成立一周年出了一本《海门县公署成立纪念册》,该册中专门收录了一篇《陈才福部叛变纪实》(约2800字)。该文用六个标题记述了该事件的经过,其中在第三个标题“叛变骚扰情形”中记述:“是日(指4月12日)午刻,陈才福带领数百人由海赴通到达八厂地方,已为友军长官及特务机关政务课主任塔尾强先生识破奸计,当即开火痛击,陈才福立时逃逸,毙匪数名。海门方面系由匪首高文星率领,就体育场集合,佯称枪决逃兵,旋即齐向海门警备队开枪围攻,幸经河野队长洞悉其阴谋,随即以机枪大炮还击,当场枪毙匪方官兵百余人,余悉溃散。其四郊联络之匪均经警备队分路痛剿,纷纷逃窜,斩杀颇多。”当然伪方的记载尽管有夸大其词的成分,但对于与陈才福事件的基本事实与党史的记载差异不大。